

批判理论中的经济分析：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与局限

陆子纯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24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31日

摘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波洛克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及其对批判理论中经济分析的深远影响与历史局限。波洛克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经济政策，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置于分析的核心，试图为危机的起因及其对经济秩序的影响提供答案。尽管这一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引发争议，但波洛克对资本主义形态变化的深刻洞察与批判性分析仍不可忽视。波洛克的研究促使批判理论转向资本主义内部关系探讨，其理论的局限性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反思空间。本文还分析了波洛克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学者的影响，澄清了早期批判理论家在经济分析上的误解。

关键词

波洛克，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兰克福学派

Economic Analysis in Critical Theory: The Impact and Limitations of Pollock's Concept of "State Capitalism"

Zichun Lu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Nov. 30th, 2024; accepted: Dec. 24th, 2024; published: Dec. 31st, 2024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Pollock's concept of "state capitalism"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 an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n economic analysis within critical theory. Drawing on Marxist crisis theory, Pollock critically analyzed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placing the market's

文章引用：陆子纯. 批判理论中的经济分析：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与局限[J]. 哲学进展, 2024, 13(12): 3431-3437. DOI: 10.12677/acpp.2024.1312505

anarchic tendencies at the center of his examination in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causes of crises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order. While his theory sparked debates within the Frankfurt School, Pollock's deep insight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capitalism and his critical analysis remain significant. His work prompted critical theory to shift its focus to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capitalism, and the limitations of his theory offer valuable space for further reflection.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Pollock's influence on scholars such as Horkheimer and Adorno, clarifying misconceptions regarding the early critical theorists' approaches to economic analysis.

Keywords

Pollock, Critical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Frankfurt School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作——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扉页上，赫然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弗里德里希·波洛克”([1], p. 1)。这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是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终身挚友与亲密助手，负责该所的所有行政与财务事务。但他鲜有理论著作问世，因此被法兰克福学派史专家罗尔夫·魏格豪斯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位不为人知的成员”([2], pp. 750-756)。若要概括波洛克一生中最显著的理论创新，则必须提及其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结构或新形态的探讨与研究。

波洛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立场，在融合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以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经济制度为实例，深入剖析了计划原则融入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界限，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从而构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3]。尽管他的理论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内部引发了争议，并遭到众多理论家的批评，但他能够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洞察资本主义的类型学变化并进行批判性分析，这一贡献不容忽视。此外，波洛克的研究促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转向对资本主义内部关系问题的探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深刻影响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全面管制社会理论的基本假设([4], p. 54)，对批判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批判理论最初的构想是将“个人的心理发展”和“文化领域的变革”与“社会的经济生活”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形成一个“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计划”[5]。然而，正如后来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克服混乱的专业化”愿景最终难以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消极的历史哲学。原因之一便是波洛克对“经济生活”分析的整合存在问题，这最终导致了经济作为社会学分析对象的地位被忽视。

2. 波洛克与经济危机的关联：从自由竞争到国家资本主义

20 世纪 20 年代，与波洛克同时期的早期代表人物，如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弗朗茨·诺伊曼(Franz Leopold Neumann)和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和希特勒上台后对社会经济动态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一系列专著和文章应运而生，经常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此时，波洛克便开始在法兰克福的自由主义思想氛围中日益崭露头角。例如，他通过《苏联计划经济中的实验(1917-1927)》一书及其对这些尝试的冷静评估，与他的同行相比显得格外突出。他对俄国实验的描述证明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一说法并不成立([6], p.

78)。通过他的经济计划研究与之后的分析,他为霍克海默的理论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学基础。此时的社会,正如霍克海默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客观上可能发生的“动荡”(Umwalzung)并没有发生在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成熟且具备了根本变革的经济物质条件的社会中,而是发生在社会进程与顺应社会的人们主观心态之间的差异之中。因此,阿多诺评论道:“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贯穿着一种绝望了的希望,那就是希望在不同一的、受体系式思维压制的个人身上、在他的贫穷痛苦中、在有限物的软弱和孤独中,尽管在思维、信仰和公共机构中有着各种各样虚假的反映、但仍然是真正的、因而是隐蔽的本质来‘拯救失望的人’”([7], p. 68)。与同时代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科学家一样,波洛克也在政治希望破灭的背景下发展了他的理论思想,他非常赞同霍克海默对社会进程变化的判断,试图揭示社会进步受阻的客观经济原因。

他利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作为工具,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置于分析的中心,试图为危机的起因及其对经济秩序的影响提供答案。波洛克关于危机影响的解释,即危机导致旨在维持私人资本主义秩序的国家干预增加,在此尤为重要。例如,波洛克对利润私有化和损失社会化的评估,在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证明了并未失去现实意义。早在1932年,波洛克就在《资本主义的现状与计划经济新制度的前景》一文中指出了“大而不倒”的困境,而这正是2008~2009年许多危机解决方案的特点:“如今,许多工业或金融企业已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至于任何国家权力机构,无论它自称多么自由,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倒闭。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企业仍可将全部利润据为己有,但却可以将风险转嫁给广大纳税人”([8], p. 24)。他因此强调了大型企业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强大能力。波洛克关于资本主义新历史阶段的观点,以及强调对新阶段进行时期划分的必要性,同样有助于识别资本主义在“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走到尽头并演变为“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最新轨迹。此外,作为最早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波洛克还分析了军事开支对社会产出增长的日益重要性——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军费开支便成为了德国和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在20世纪30年代,波洛克特别关注大萧条及其后果,他的著作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占据了重要版面。在30年代初,波洛克主要将这一由国家驱动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理解为基于现有社会关系结构的一种改良,他在《资本主义的现状与计划经济新制度的前景》一文中指出:“尽管在这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内部,萧条期会更长,恢复期会更短且更急剧,危机也会比自由竞争时期更具破坏性……但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本身并不太可能出现”([8], p. 22),尽管这场危机前所未有地严重,“但资本主义手段能够克服这场危机,垄断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而我们尚无法预测其具体时长”([8], p. 16)。但这一观点在随后的30年代中发生了巨大转变,在他的下一篇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章《关于经济危机的评论》中,波洛克明确收回了之前关于可能存在的政治与社会趋势对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抵制的观点,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已发生深刻变化:“我们以前表达过的观点是,资本所有权退化为仅仅是一种盈利的所有权,这对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构成了障碍,但鉴于在此期间出现的大规模控制机制,这种观点已不再被视为严重的反对意见”([9], p. 349)。在经济层面,他继续认为“预测资本主义必须在不远的将来结束是错误的……正在结束的不是资本主义,而仅仅是其‘自由竞争’阶段”([9], p. 350)。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实施的深度和广度导致一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干预出现”([9], p. 347)。可以肯定的是,波洛克在此时就描绘了一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形式的前景,在这种形式下,国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控制经济。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波洛克才将其思想激进化,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该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期刊的两篇文章《国家资本主义:其可能性与限度》和《民族社会主义是新的社会秩序吗?》得到阐述。

在文章中,波洛克将国家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理想的典型结构与模式,他通过系统阐述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以及美国新政和军工业发展中所观察到的经验趋势来构建这一模式。波洛克对国家资本主义分

析的出发点是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假设，即大萧条使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手段过度扩展，并在垄断日益加剧的时代废除了作为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竞争。恢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相反，从这场全方位的危机中，人们不自觉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只能通过对经济的全面引导和组织才得以解决。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对 19 世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及其后继者垄断资本主义的继承，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后继者，国家承担了私人资本家的重要职能，对利润的兴趣依然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它不是社会主义” ([10], p. 72)。在这一后自由主义发展阶段，作为间接指导工具的市场被直接计划制度所取代，国家因此成为经济中的核心行为主体，承担了协调市场和私营企业的核心职能。

在国家资本主义下，价格失去了其作为稀缺性指标的功能。虽然利润利益并未被取消，但它们必须服从于计划和高于一切的“公共利益”，即使私有制继续存在，它最终也要服从于国家控制，通过关键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利润从属于增长。与其他当时描述经理人治理发展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贝尔和米恩斯或伯纳姆)相比，波洛克更为激进地认为，传统的资本家沦为租金接受者，而工业和金融业的领导者仅代表政府的附属机构，资本家可能拥有生产资料，但他们并不控制生产过程，因此不是管理者。与此同时，建立国家控制是为消除经济危机的最重要原因，并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从而使“失业的鞭子”被“政治恐怖” ([10], p. 210)所取代。波洛克总结道：“我们无法发现任何内在的经济力量、旧的或新的经济规律能够阻止国家资本主义的运行。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为消除经济萧条、累积破坏过程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失业的经济原因提供了手段” ([10], p. 217)。这与 20 世纪上半叶以前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体系截然不同，当时权力精英和垄断企业本身仍然是“经济规律”的玩物。从那时起，只有“非经济边界”，如资源稀缺或由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造成的界限，才被认为是问题的。政治取代了经济领域，成为经济调节的中心，因此“政治管理”问题取代了市场驱动的交流过程中的问题 ([10], pp. 217-221)。波洛克进一步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两种变体：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 ([10], p. 201)。后者是可能存在的，也是更可取的，但他认为更可能出现的是前者。针对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通过指出民族社会主义时期德国企业国有化和强制性卡特尔化的趋势，从经验上证明了他的分析——这一趋势是通过由国家官僚机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防军和行业领袖组成的强大行政机构来推动的，经济过程在一个计划的框架内进行，该计划最终通过政治权力来实施：“在所有国家活动领域(在国家资本主义下，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臆测和随机应变都让位于科学管理的原则” ([10], p. 206)。通过这种方式，就为在社会其他领域实施工具技术理性创造了先决条件。而针对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以美国为典型代表，认为“国家本身受人民控制” ([10], p. 221)，没有任何保证“以任何进步意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 ([10], p. 225)。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景仍然黯淡，潜藏的矛盾将导致更多的战争，而不是解放运动的增加。

3. 波洛克与批判理论的政治学基础：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

波洛克对早期批判理论的发展有多大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两条论证线索，这些线索建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被主要遗忘的学者工作基础上，如安德鲁·阿拉托、赫尔穆特·杜比埃尔、阿克塞尔·霍耐特、贾科莫·马拉茂、马丁·杰伊和戈兰·瑟伯恩。

首先，波洛克对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成为了一种批判形式的经济基础，这一批判形式在面对社会生活的封闭性时感到绝望，并转变为普遍的顺从。霍克海默就在《犹太人与欧洲》 ([11], pp. 115-320)和《权威国家》 ([12], pp. 55-79)中详细提到了波洛克。此时霍克海默与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看法决裂得很明显，他在波洛克的支持下断言，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国家“现在被视为一种新社会形态的代表”，即一种彻底改变并最终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对权威国家的反思中，霍克海默将几个政治命题融入到波洛克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例如工人组织服从官僚化过程并丧失独立性的假设，这

是波洛克所提出的。此外，霍克海默第一次将苏联视为一种极权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波洛克也在脚注中提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最接近国家资本主义分配模式的是苏联，德国的趋势也显示了同样的方向” ([10], p. 221)。从而进一步打破了以前的观念。另外，尽管较少使用波洛克的术语，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波洛克进行了大量的实质性引用。例如，二者在书中将匿名官僚结构形式中的工具技术理性视为历史的驱动力，这与波洛克关于对需求的全面控制伴随着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工业这一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高度相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波洛克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例如，阿多诺在二战期间批评波洛克将描述置于批判之前，并声称在一个内在矛盾的社会中不存在不矛盾的经济；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阿多诺将诺伊曼的政治经济分析解读为对波洛克工作的合理批判 ([6], p. 380)。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他们都追随波洛克。对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计划和国家干预主义似乎蕴含着合理组织社会的希望，而现在这些却与他们之前的希望背道而驰。正如霍克海默所言：“随着每一项已实现的规划，原本认为不必要的一些镇压变得越来越多。相反，随着计划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镇压出现了” ([12], p. 72)。

第二，波洛克的工作也为忽视经济作为分析对象提供了理由。虽然第一代批判理论从一个全面的跨学科研究计划转向了消极的历史哲学，并对理性的自我毁灭做出了诊断，这一过程受到了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但另一种发展也随之而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提出的先进、明确的经济批判使批判理论家们忽视了对社会经济分析，而这些分析最初是 20 世纪 30 年代学派跨学科研究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波洛克的贡献在于，他断言：“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已经失去了它的研究对象。……以前，经济学家绞尽脑汁解决交换过程的难题，而在国家资本主义下，他遇到的仅仅是管理问题” ([10], p. 217)。根据波洛克的结论，新的治理方法和社会发展无法用经济学的范畴来理解，这为批判理论家搁置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研究工作提供了合理理由。同样，这也促使他们默默放弃了跨学科研究计划。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波洛克这位经济学家支持将研究重点从对经济“基础”的分析转向对全面管制社会的“上层建筑”，即文化、意识形态和消费形式的分析，而在这些形式中，社会经济动态的相关性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考虑。因此，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社会科学界普遍认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学者从未系统地研究过经济、持有“批判理论从未真正关注经济”这一观点的真实内核。

此外，通过民主主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波洛克预见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 1945 年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秩序特征：稳定的社会，不存在可行的替代方案，演变出了较为温和的被迫服从形式。波洛克在其 1945 年后最成功的研究成果《自动化》[13]中，对现代企业自动化过程的社会学结果进行了研究，他坚持自己的基本假设，同时强烈地指出了经济计划的可能性。尽管如前所述，阿多诺对波洛克的态度比霍克海默更为谨慎与保留，但他们并没有阻止忽视经济学基础研究这一整体趋势。

总之，即使“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在形式上已被放弃，后来被“晚期资本主义”等概念所取代，但波洛克的分析仍被证明对第一代批判理论至关重要。只是下一代批判理论家，如哈贝马斯等，才探索出了新的道路。晚期资本主义是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但仍然充满了矛盾或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多数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仍然没有质疑资本主义的经济指导能力，而是质疑其社会文化合法化能力。例如，哈贝马斯在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和劳动力工会化的背景下创造性地发展了关于危机与国家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增长的扰动最终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处理和转移，通过政治领域进而转入社会文化系统。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国家介入自由市场来避免，但这种活动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非经济”危机倾向，即合理化危机，并进一步导致了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14]。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经济危机可以避免，但这会使国家面临破坏其自身合法性的危险。

4. 波洛克政治经济学的启示与局限：批判理论的边界与现代资本主义危机

波洛克是最早从批判角度分析 1929 年后世界经济发生深远变化的经济学家之一。仅凭这一点，他的贡献就仍值得一读。特别是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对“大而不倒”失败困境的分析，以及国家与资本之间密切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概念，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波洛克的研究阐明了资本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能力——这些见解在当代世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20 世纪 30 年代，以税收国家为基础、由强大的工业垄断企业主导的国家嵌入和政府驱动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以依赖资本为基础的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即一个收债和市场嵌入式的国家。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交织在一起的资本霸权，导致 21 世纪的许多西方国家尽可能建立和实施市场机制，避免渐进式的再分配，并以信贷取代税收。与 20 世纪 30 年代一样，这意味着民主参与的削弱和对普通公民影响经济管理和公共财政的能力的限制。我们可以从波洛克那里学到，资本主义的管理一次又一次地导致试图使其经济政策机构免受民众民主行动的干扰。波洛克的其他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分析同样具有价值，例如关于利润私有化和损失与风险社会化的观点。波洛克关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思考同样为防止纯粹的结构主义分析并指出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见解。当然，他的思想也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他对 20 世纪 40 年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由于波洛克的见解被纳入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之中，使得当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其他缺陷也被放大了。接下来，下文将简要讨论波洛克理论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主要焦点将放在他政治经济学工具的局限性上。通过对他人利用政治经济学工具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和潜在限制，从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参考和借鉴。

如上所述，对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诊断和全面管制社会的理论导致了创建跨学科研究计划目标的放弃，并导致文化分析日益独立于经济分析。同时，早期批判理论还存在固有的还原论倾向。尽管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时期，极权统治、文化控制和个体适应的图景在历史上是合理的，但它在系统性方面也被证明是“有缺陷的理论建构的结果”([15], p. 37)，因此，社会行动的余地等被系统地忽略了。从更注重行动的理论角度来看，早期的批判理论缺乏对社会和制度变革以及结构与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性理解，或更具体地说，缺乏对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过程的理解。将个体描绘为受匿名形式控制的被动个体——这一描述也适用于资本家——忽视了这些个体是如何参与社会融合过程的，更具体地说，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解释和行动能力参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变革的。

在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分析工具层面，还可以识别出几个不足之处。从一开始，早期批判理论的“外圈”，尤其是诺伊曼和基希海默，就超越了“内圈”的狭隘框架。在《巨兽：1933-1944 年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中，弗朗茨·诺伊曼通过指出后自由资本主义指导能力的局限性，对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提出了合理的反对意见。诺伊曼批评波洛克未将分析垄断作为竞争的“辩证”对立面，而是抽象地对比这些概念，以支持其关于压制竞争和危机的论点。与此相反，诺伊曼强调了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私人资本积累的必要性 and 危机倾向的持续存在，并讨论了法西斯政权的矛盾和政治冲突，法西斯政权并不真正代表一种单一的统治形式。据诺伊曼称，波洛克将国家资本主义的自我描述——“千年帝国”([16], p. 225)与其远为不一致的经验现实混为一谈。另外，从当代比较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识别出更多不足之处。波洛克与当时其他批判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些片面概括可以追溯到对市场、企业家以及国家缺乏足够复杂理解的问题上。特别是 20 世纪 40 年代，波洛克确定了政治和经济等理想的典型范畴，并过早地从国家与经济的融合趋势中得出了结构性资本主义解体的必要性，其中前者获得了优先地位。此外，他对这些理想类型的描述是静态的。与早期批判理论的其他学者一样，古典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仅仅作为一个理想化的对比案例出现，这种理想化还包括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资本主义的原始形式并不赞成国家活动。就危机理论而言，波洛克同样存在不足，因为他主要从市场比例失调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功能失调，即简单地将其视为市场无计划性的结果。但众所周知，危机分析必须努

力理解一系列复杂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包括市场层面和国家管理市场的能力，还包括生产、金融、分配和消费层面，同时还需考虑到导致资本主义危机和失衡的其他政治和社会因素。然而，尽管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被理解为代表了政治优先于经济，但波洛克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充分的危机政治理论。此后，哈贝马斯和奥菲才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这一理论。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后自由资本主义全球范围的有效性甚至统一性的假设缺乏说服力。事实上，1929 年大萧条后加强的国家干预导致了跨国政治指导能力的提高，甚至自由主义圈子也认真对待了关于指导和规划的讨论。但波洛克尽管区分了民主和极权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却将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在系统上、历史上和经验上都是错误的。

保守主义谴责战后共识是迈向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跳板，尽管全面管制社会的理论在与保守主义的辩论中大有裨益，但战后民主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从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到瑞典的社会民主凯恩斯主义，都被批判理论家所忽视。此外，后自由资本主义在 1945 年后的长期繁荣中趋于稳定，这其中的因素远不止国家指导能力的提高，但这种稳定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回顾西方历史的发展会发现，尽管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都存在经济的部分政治化，但资本主义仍然在周期性地发展并产生严重危机，尤其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和 2007 年之后。竞争机制和活跃的市场力量并没有因为所谓的政治主导地位而失效，相反，在现代经济日益国际化和跨国化的背景下，它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获得了独立性。在 20 世纪 40 年代静态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中，资本家似乎是服从于国家计划的职能部门，与此不同的是，现在的公司已颠覆了战后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并在此背景下废除了战后社会契约中的重要协议，如渐进式再分配。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 渠敬东，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 Wiggershaus, R. (1994) Friedrich Pollock—Der letzte Unbekann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Die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
- [3] 周凡，王宁. 计划原则嵌入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论波洛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J]. 学术研究, 2020(8): 7-17+177.
- [4] 斯蒂芬·埃里克·布朗纳. 批判理论(牛津通识读本) [M]. 孙晨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 [5] 霍克海默，王凤才. 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5): 123-129.
- [6] 罗尔夫·魏格豪斯.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上册) [M]. 孟登迎，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7] 贡尼·林古特. 霍克海默传[M]. 任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8] Pollock, F. (1975)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8-27. <https://doi.org/10.5840/zfs193211/289>
- [9] Pollock, F. (1933) Bemerkungen zur Wirtschaftskris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2, 321-354. <https://doi.org/10.5840/zfs1933231>
- [10] Pollock, F. (1941) State Capitalism.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9, 200-225. <https://doi.org/10.5840/zfs19419224>
- [11] Horkheimer, M. (1939) Die Juden und Europa.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8, 115-137. <https://doi.org/10.5840/zfs193981/24>
- [12] Horkheimer, M. and Wirschaft, A.S. (1942) Recht und Staa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 [13] Pollock, F. (1956) Automation. Materialien zur Beurteilung der ökonomischen und sozialen Folgen.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 [14] 蒋天婵. 从晚期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哈贝马斯危机分析模式的当代价值[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2(6): 22-28+110.
- [15] Honneth, A. and Theoret, K. (1989) Kritische Theorie. Vom Zentrum zur Peripherie einer Denktradition [Critical Theory: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of a Research Tradition].
- [16] Neumann, F. (2009)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